

東山文史

(第四輯)



廣州市東山區政協學習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东 山 文 史

第 四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东山区委员会
学 习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封面题字：王永华

封面设计：叶峥嵘

东山文史（第四辑）

广州市东山区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广州市东山区署前路8号 邮政编码：510080）

广州空军政治部印刷厂

*

787×1692毫米 32开

广州市非营利性出版准印证

（95）穗印字第0235号

《东山文史》第四辑

审 稿：周伯鹏 黄启业 吴江天

编 辑：吴江天

目 录

回忆在抗日战争中的二三事 林彩容 (1)

建国初期华侨知名人士回国定居东山区

概况 林颖榆 (7)

水上居民上岸定居梦想成真

..... 陈耀池 陈伟甫 (17)

就事论事 吴 冲 (21)

广州市的私房改造 陈耀池 陈伟甫 (34)

东山区解放后医疗事业发展概况 邓开梅 (41)

东山区爱国卫生运动史话 何 铭 (48)

东山区卫生防疫工作发展史

..... 何 铭 何任能 (58)

1958年冬东山区发生麻疹暴发性大流行

的情况 邓开梅 (64)

东山区中医工作发展概况 区志巧 (67)

谈谈“饮食卫生”管理 何 铭 (74)

帮助水上人民文化翻身的水上学校

..... 吴基修 (80)

广州市育才小学是怎样创办起来的?

..... 蔡 莹 蔡德贤 周灼芬 (83)

建设工人新村子弟小学

——东区第七小学的创办 黄启业 (88)

她曾经是广州市基础教育的排头兵

——忆记中山四路小学

..... 蔡德贤 梁懿娴 (91)

红火炬小学发展的三个历程 王桂英 (103)

九年制教育试验实施情况 孔巧龄 (108)

广州解放后第一所机团举办的幼儿园

——广州市第一幼儿园 吴慕修 (110)

复办后的区教师进修学校

..... 余丽芳 梁懿娴 (114)

新中国首任国家排球教练马杏修 (续)

..... 吴彩只 (118)

东较场的沧桑 何 铭 (122)

东山区的农业与土地使用的变迁

..... 吴 裴 (125)

清朝君主立宪下的广东咨议局 何 铭 (130)

后记 东山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133)

回忆抗日战争中的二三事

林彩容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不少人都回顾了当年的情况并大唱抗日时期的革命歌曲，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近，我也参加了珠江纵队游击老战士歌咏团，到学校和市儿童活动中心演出。老师和家长们反映很好，认为这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

我原是省妇联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时因是当权派，先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后调到广州市越秀区，以后又调到东山区工作。在东山区离休。

回想 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由于国民党采取不抵抗主义，日本侵略者步步逼进，很快东北沦亡，华北沦亡，华南广州也失守。日本帝国主义在入侵之前先进行大规模轰炸。由于连续大轰炸，广州市民伤亡惨重，情况十分凄惨。当时，我参加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和锋社的抗日救亡工作，还组织了救护队，要我们在飞机轰炸时到现场进行救死扶伤的抢

救工作：看到轻伤的则进行包扎，重伤的则送到医院抢救。那到处死尸，残肢断腿，鲜血淋淋，或哭爹喊娘的惨景，我至今历历在目，无法忘怀。

抗战期间，广州西濠口搭建了“献金台”（称“八一三”献金）。当时，不少市民纷纷把自己的金耳环、金戒指、金手镯等都献了出来。一天，正当人们在献金台献金时，日本飞机来了，在人们头顶不断盘旋。正在这时，有一位青年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不少群众也跟着高喊起来。后来，国民党当局为这事进行追查，查来查去查不出什么结果来。这事说明群众对共产党坚持抗日的威信在心中是很高的。

抗战初期，我参加廖承志同志在广州哥伦布（即现永汉电影院对面）六楼主持的一个抗战再动员大会。当时，国民党当局知道要召开这个大会，便派了特务来捣乱。我们到了会场，我见到了区（梦觉）大姐。尽管在大会上特务喊打喊杀，混乱一时，情况紧张，但廖承志同志仍勇敢地走上讲台，强调全国军民团结一致抗日的重要，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的阴谋。当时场面既危险又紧张，如果掌握不好，后果不堪设想。廖承志同志英勇、沉着、果断的态度，教育了我们大家。与会青年一致要求坚决抗日，场面热烈，那些特务看到形势不妙，便灰溜溜地走了。共产党号召全民团结一致抗日的主张取得了又一次胜利。

我参加锋社话剧团做了很多抗日救亡工作。我们

每星期都要到女青年会舞台演唱革命歌曲和演抗战的戏剧作宣传。有一次，我在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的话剧。何芷同志演剧中的“父亲”，我演“女儿”。当父亲打女儿的时候，观众深表同情，以为是真的，放下不少钱来。但我们演抗战戏，进行抗日宣传，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禁止。斗争何其激烈。

我在1936年9月参加锋社话剧团，参加秘密读书会读马列主义、毛主席的书，我还参加了秘密学联，在学生中宣传抗日组织革命读书会，并做了很多抗日救亡工作，广州解放后党组织为我办了老红军待遇。广州沦陷前，我参加过很多次大游行。1937年12月9日，即“一·二九”两周年纪念大游行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当时我在市高中参加军护训练，是市二中女生与市美女生集中在市美学校内进行的。男生则集中在高第街集训营。在女生集训营中，有共产党的领导。秘密学联负责人通知我到了集训营要听市美周微雨同学（共产党员）的话，是她通知我和刘凤岐同学（后来是中央文化部副部长丁侨同志的爱人）两人外出参加这次游行的。我们两人谎称家人有病要请假外出。后来，游行队伍到了市美校大门口时，同学们立即冲进学校与校内的同学会合后再冲出来参加大游行。因为学校当局早就宣布，不准学生参加游行示威。学校当局后来抓了一些学生进行质问，结果问来问去问不出什么名堂来。后因局势紧张，此事便草草了事。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直迫广州。当时党组织分配我在学校坚持工作，我在市二中任班的支部书记。1938年初，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成立。因日军侵占广州，很多人被迫疏散回乡或另投他地。我动员了一批同学参加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撤出广州。我们认为，反正被日本鬼子害得书也念不成了，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只有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才有出路。我当时既没想到自己的家庭，也没考虑自己的前途将来又会怎样，下了决心就再不回头。我们抗先队几百号人无车船可乘，便步行到花地，再到佛山、四会凤凰村。在路上，我们扔掉了很多衣物用品，因为要赶路拿不动了。我们从白天走到黑夜，不停地赶路，又怕掉队，又不敢睡觉，真是辛苦极了。在凤凰村，我们选出了二十三名抗先总队部委员，其中有一位女的，就是：区梦觉、林彩容、刘凤岐。

当时，大家身上都没有钱，连饭也吃不上。后来见到区大姐，知道她在动员委员会工作。她为我们400多名队员安排参加动员委员会战时工作队的工作，才解决了大家的吃饭问题。我们从此既是动员委员会战时工作队又是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就这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我曾经动员参加抗先撤出广州的那些同学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后来他们的到新四军或十二集团军，有的在战场上牺牲了，有的因病故去，剩下的不多了。

1939年，我被分配到粤中抗先队工作。到了当地，要从头学习本地话，才有利于做好抗日宣传、举办训练班、往前线慰问等等工作。我们抗先组织，有那么多热血青年，如此艰难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后来却被国民党当局无理解散了。

因工作需要，党组织通知我与李青同志到东江纵队司令部报到另行安排工作。我们拿了介绍信，先到广州乘船去东莞后街交通站联系上，之后由一名十多岁的小男孩给我们带路，说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交通站负责人叫我打扮成新娘子的样子，头梳了一个髻，李青则帮我挑行李，如新娘回娘家似的。我们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到了解放区并见到了黄康同志。见到了熟人，心里就安定多了。后来听说日本鬼子又要来了，部队要开拔，我们跟着部队急行军。连续日夜行军，很不容易啊！特别是夜晚走田埂路时，脚老是踏到水田里。老同志教我们黑夜走路要记住：黑坭白石，光水塘。我们经过一个村庄时，看见被敌人实行“三光”政策后的死寂惨景，既没人烟、还散发出一阵阵死人的臭味。这一切无法不激起我们中华儿女的深仇大恨。当我们又来到一个地方时，看见鬼子兵在桥头上把守着，我们一时无法通过，就想用两条绳子放在桥下水里敌人看不见的地方沿着绳子走过去，后觉不安全而取消这一办法，只好绕道走了不少冤枉路才到达司令部。到了司令部后，见不少

人前来司令部开会，传出我的爱人陈能兴来司令部时在路上遇敌战斗中牺牲了。真是突然袭击，如晴天霹雳，我万分悲痛！但终于顶住了，并耐心等待组织的调查核实。

我在东纵一面学习一面工作，一段时间后，党组织在1945年分配我做地下工作，由机要交通员何琼同志带路离开东江纵队。不久，陈能兴同志又由东江纵队分配和我一起做地下工作来了，直到广州解放。

解放后，组织安排我担任广州市总工会女工部长，从此，我一直在广州工作到离休。

回想当年，为了革命，我离开广州十几年，与家庭断了联系。父母为我而担心，不知我是死是活。直到广州解放了，我们一家才得于团聚。那时，我的一个女儿（在外出生后送回亲人抚养）已经8岁了，我们相见还不相识哩！

中国人民终于得解放，我们要牢记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今天来之不易，更要牢记日本侵略军在我们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往事不能重演。今天，我们一定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加倍努力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作者：原广州市东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东山区政协第七、八届委员会副主席）

建国初期华侨知名人士 回国定居东山区概况

林颖榆

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侨无不为新生的祖国而欢欣鼓舞，他们终于摆脱了“海外孤儿”的命运，有了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他们的爱国爱乡热情得到更大激发，不少华侨富商结束在海外经营多年的企业，变卖家产物业回到祖国参加投资建设；意气风发的华侨青年满怀报国之志回国求学，立志将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伟大的建设事业；老华侨更是喜上眉梢，携眷回国定居，实现“落叶归根”的夙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洁、蚁美厚、许崇德、刘家祺、刘宜应等爱国侨领冲破重重困难，带着巨资回到祖国的怀抱，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为振兴我国薄弱的工业，发展华侨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事迹感人，以我所知，略谈一二。

1951年3月，黄洁、薛两清、王源兴、李祝朝、施子卿等5人组成华侨工商业考察团回国考察，在广州了解工业生产和有关“公私合营华南企业公司”的

营业情况后，即北上到武汉、北京、天津、青岛、上海等地考察。经过三个多月，最后决定在广州投资，成立“公私合营华侨工业建设公司”（简称华建）。1952年考察团5人的家属也回到广州定居，居住在中山三路东皋大道。

黄洁出生于广东台山县，他的祖父与父亲都是新加坡华侨。1920年他随父亲去新加坡，1934年到印尼开始经营金饰。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支援祖国抗日战争，他建议金饰业按年利四分之一捐献抗日，并得到金业互助社社员的支持。1942年2月15日香港沦陷，他不愿意在日军统治下当顺民，离开香港去玛鲁亚。在那里，他接触了许多进步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对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日军占领期间，黄洁对在印尼苏罗日惹开展的民族独立武装斗争也曾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印尼独立后，印尼副总统曾写信向巨港信记公司道谢。1945年9月，他与许崇德、颜西岳、陈剑敦、张振华等集资筹建了巨港信记有限公司，经营橡胶加工业。信记公司发展很好，黄洁被选为巨港华侨总会副主席，兼总会属下的教育委员会主席。他一贯热心华侨教育事业，1939—1941年被选为巨港华侨学校校董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盼着早日为祖国贡献力量，但是回国就意味着放弃长期在侨居国打下的坚实基础，他经过深思熟虑，作出了选择。他在给老朋友张枫的信中

这样写到：“窃思目前摆在自己面前的有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依然在异国赚钱当‘南洋伯’；一条是回国追随共产党，为建设新中国竭尽棉薄之力……。继续当‘南洋伯’一途，以今之形势观之，也觉前途多艰：查以侨居国的当政人，一面痛恨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一面由于经济落后又不得不依靠帝国主义以求生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各国民族独立运动如火如荼，方兴未艾。一些国家以维护发展原居住民族经济为名，恣意排华，侨居国连年出现这些现象，殊堪忧虑！中国共产党现阶段实行新民主主义，是适合国情的。吾相信，这制度之施行，是能将中国这个贫弱的国家救活起来的。祖国解放不久，从政治到经济，都出现了一派新气象，更增强了我这信心。”黄洁回国后，全副身心投入到开展华侨投资工作上面，担任了华建公司董事长、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副董事长。他常说：“我们要尽快拿出事实，消除海外华侨对回国投资的疑虑。”他曾三次赴香港听取华侨、港澳同胞对回国投资的意见，返穗后，他向省有关领导反映了一些关系到能否调动投资人积极性，但也比较敏感的问题。如：向华侨投资公司投资后的阶级成份问题，即领取股息算不算剥削？外汇付息问题，股本转让问题等等。他还积极筹办广州华侨小学，侨光中学，并为两校捐款。1958年他与陈灼其等归侨一起发起并筹建东山区华侨通用机械厂。黄洁还敢于直言，针贬

工作中的过失。对侨乡土改，他曾批评过“左”的做法，指出“侨乡土改偏差大，土改后，侨乡十室九空”，“华侨大户摘掉地富帽子后，政策没落实”。1957年他在人代会上直接陈言，指出不应该把某些爱国人士划为右派。1961年黄洁被选为广东省副省长，他还被选为第一至第三届省人大代表，第一、第三届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执委，广州市侨联副主席，全国侨联常委等职。

王源兴出生于福建龙岩县一个贫农家庭，1926年前往新加坡，当过工人、小贩、三轮车夫、店员。1931年任巨港恒丰公司经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担任巨港华侨筹赈总会副主席。1938年和1940年参加了陈嘉庚先生发起召开的南侨筹赈总会大会，积极筹款赈济祖国难民，号召华侨捐献抗日。1945年他被选为巨港华侨总会主席。回国后，王源兴参与筹建广州华侨新村和华侨小学，任华侨新村建设委员会主任、华侨小学筹委会主任，带头向华侨小学捐款10万元人民币。华侨小学落成后，按他的意见，在华侨小学礼堂正面端刻了“华侨热爱祖国”6个大字。1962年他又为筹建侨光中学捐资。他先后担任过广州市第一届人大代表、广州市侨务局副局长、华侨小学董事长、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副主席、北京市侨联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薛两清曾在巨港经营橡胶，积极参加当地的民主进步活动。1950年5月，在巨港的侨领中他率先回国考察，在武汉受到了叶剑英元帅的接见，在北京受到了中央华侨委员会的热情接待，对华侨回国投资的政策问题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回巨港后，他即向黄洁、王源兴、许崇德等侨商介绍祖国形势，并动员他们回国投资。“尽快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祖国需要我们”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促成了“华侨工商业考察团”回国。薛两清回国后一连负责了几个大工程。他事业心强，工作埋头苦干。华建麻袋厂1952年破土动工，同年就投产，速度之快，与他的辛劳是分不开的。麻袋厂基建工程完成后，他又去抓华侨大厦工程和开辟华侨新村。华侨新村村址选在市北郊，野草漫径，荆棘丛生。接受任务后，他带领施工队伍进驻工地，开道路，辟山岗，很快完成了部分小区的开发工程，并于1955年先建成华侨小学和部分住宅区。他经常接待归侨，为他们安排活动，对于回国定居的朋友，还帮其安家设户。他在思想上有迫切跟党走的要求，但当时他的“资方代理人”和“华建股东”的身份却成了他进步的“包袱”。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后，省统战部号召民主人士大胆提意见，薛两清也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对一些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意见，指出有些党员干部整天讲大话，领国家薪水不工作，等运动来了当大将。反右开始后，他因此差点被